



E.C.Bridgman and Early Sino-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

裨治文

与早期中美文化交流

张施娟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E.C.Bridgman and Early Sino-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

裨辰文

与早期中美文化交流

张施娟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裨治文与早期中美文化交流/张施娟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308-08239-6

I. ①裨… II. ①张… III. ①中美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 IV. ①K203②K7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3024 号

裨治文与早期中美文化交流

张施娟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80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239-6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前　　言

1784 年,美国“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商船抵达中国,拉开了早期中美贸易的序幕。中国与美国的交往是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古国与一个历史非常短的国家之间的交往,是拥有数亿人口的东方古文明与发展中的最新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的接触。^①

两国的互相认识却起源于 1582 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美国”是我们今天对“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简称。其实在中国认识美国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对美国的称呼有很多,单单在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中,就出现了米利坚、弥利坚、美利哥、亚墨理驾合众国、兼摄邦国、联邦国、育奈士迭等各种称呼。^② 从这么多的称呼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曾经是不统一的。笔者以为迄至 19 世纪末,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16 世纪起至“中国皇后号”来华之前。

相对欧亚大陆的文明古国而言,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到 1492 年,才有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发现美洲。此后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纷纷来到这块新大陆,英国在 1497 年就到达北美。但对中国人来说,认识美洲则是比较晚的事情。

最早把美洲介绍给中国人的就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他在 1602 年 (万历三十年) 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对南北美洲作如下介绍:

……若亚墨利加者,全为四海所围,南北以微地相联,……南北亚墨利加并墨瓦蜡泥加,自古无人知有此处,惟一百多年前,欧逻巴人乘船至其海之地方知。然其地广阔而人蛮滑,迄今未详审地内各国人俗。^③

^① 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1 页。

^② 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73 页。

^③ [意]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禹贡学会 1933 年影印本,卷四。

在利玛窦地图中,还出现了许多新地名,如:北亚墨利加、新拂郎察、新以西把你亚、加拿大国、小以西把你亚、古巴岛、可尔得勒亚尔地、亚伯尔耕国、大入尔国、墨是可,等等。

从一些地名上可以看出,当时涉足北美的欧洲殖民国家主要是法兰西和西班牙。比如,新拂郎察,即新法兰西,指此区域为法兰西所有;新以西把你亚,即新西班牙,则指这地方为西班牙所有。

利玛窦地图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北美地理,从此中国人知道地球上还有美洲,汉文中有了“加拿大”、“古巴”、“牙买加”等美洲地名,这些地名沿用至今。

虽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但在利玛窦等人来华时,他们本身对北美也知之甚少。利玛窦等人知道“墨是可”国,“地产各色鸟羽,人辑以为画,山水人物皆妙”,也知道“夜叉国”的居民(对照地图应指现在格陵兰岛上的爱斯基摩人,笔者注)“穴居,皮服,不知骑”。但是毕竟北美尚未完全开发,许多地方还“未有人至,故未审其人物如何”。^①而且《坤舆万国全图》也没有点明哥伦布。

最早明确提到哥伦布的是耶稣会士艾儒略(Julio Aleni)在1623年撰写的《职方外纪》。

《职方外纪》介绍了哥伦布(书中称为“阁龙”)发现美洲(书中称“亚墨利加”)的情况,作者写道:

初,西土仅知有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三大洲……至百年前,西国有一大臣名阁龙者……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气味,忽有省悟,谓此非海水之气,乃土地之气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国土矣……阁龙遂率众出海,辗转数月,茫茫无所得……阁龙志意坚决,只促令前行。忽一日,船上望楼中人大声言:“有地矣!”众共欢喜,颂谢天主,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②

《职方外纪》共五卷,其中卷四专述“南北亚魔力机和墨瓦蜡泥加”。与利玛窦地图不同的是,《职方外纪》还介绍了新大陆命名的原因。书中写道:

亚墨利哥(指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者,至欧逻巴西南海,寻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亚墨利加。^③

利玛窦、艾儒略等人的著作向中国人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除个别人士对此有一定吸收外,大多数人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作为正史的《明史》

^① 以上均采自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禹贡学会1933年影印本)上的注文。

^② [意]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120页。

^③ 同上,第120页。

《意大利亚传》就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其说荒渺莫考”^①。《清续文献通考》甚至不承认美洲的存在，贬斥西方传教士宣传的“五大洲”说是“语涉诞狂”，“盖延战国裨海之说”^②。

虽然中国人对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包括北美洲在内的地理知识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少数接触过这类新知识的人对美洲或忽视，^③或弄错，^④但在18世纪，还是有一个中国人到过美洲，并留下可信的记载，他就是随耶稣会士艾若瑟(Jos. Ant. Provana)去罗马教廷的樊守义^⑤。

1707年，樊守义等人从澳门出发，绕过好望角，因舟中乏水，曾经到过亚墨里加洲巴以亚府(今巴西萨尔瓦多城)。樊守义回国后，在其追忆写成的《身见录》中描绘了他对巴以亚府的认识。

樊守义是第一个有史可查到过美洲的中国人，《身见录》则是第一篇中国人的美洲游记。^⑥ 遗憾的是，樊守义仅至南美，并没有提及北美。

第二阶段：从1784年起，止于19世纪中期或1840年鸦片战争前。

中国人真正开始认识北美是在美国建国以后。1783年，英美签订《凡尔赛和约》，美国独立。美国建国后很重视发展对华贸易。1784年就有“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12月27日驶离，次年5月10日返抵纽约。^⑦ 此后，跟随“中国皇后号”纷至沓来的美国商船，在整个18世纪，共有118艘之多。^⑧

18世纪的美国人在中国沿海的活动并不引人注目，但进入19世纪，随着来华美国船只的增多，美国人在中国沿海的表现越来越活跃。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英美两国之间因为在广州的矛盾和斗争开始尖锐起来，多次发生军事

^① 《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传·意大利亚传》。

^② (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四裔考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③ 雍正年间陈伦炯所著《海国闻见录》即是如此。《海国闻见录》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国情了解和介绍较多的一部著名的书。从陈伦炯的自序看，此书依据有二：一是与其父亲“出入东西洋”等地所耳闻目见之知识；二是对相关书籍图文的阅读和查询。但是该书上卷虽有《大西洋记》，但对大西洋沿岸的美洲，却一无所记；下卷地图六幅，虽有《四海总图》，但也不见美洲所占之西半球。

^④ 乾隆时期名士杨复吉在《海国闻见录》跋中，把加里曼丹岛和菲律宾群岛的班乃岛、宿务岛等地当做南北美洲。

^⑤ 樊守义(1682—1753)，亦作守利、守和、诗义，字利如，山西绛州(今新绛县)人。

^⑥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3页。

^⑦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9—11页。

^⑧ 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载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冲突，互相掳获商船的事件时有发生。^① 1814 年，英美船只甚至角逐到黄埔江面，因此中国政府曾不得不受理英美两国在中国境内发生冲突的案件。二是美国船只在中国沿海也有多次与中国接触之行为。美国在 19 世纪 30 年代就多次派遣船队到达中国。其中主要有，1832 年巡洋舰“波托马克号”(Potomac) 来广州访问，当时中国当局命令美国领事“勒令该船开帆驶回本国”^②。1832 年 11 月，美国派遣的埃德蒙·罗伯兹(Edmund Roberts)远征队曾在广州靠岸。^③ 四年后，罗伯兹又乘“孔雀号”到澳门靠岸。^④ 期间，还有 1821 年(道光元年)发生的“德兰诺瓦事件”^⑤，使得中国当局与美国商人直接发生联系。“德兰诺瓦事件”使中美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出现了仅有的中断。

那么，在上述背景下，中国人对美国了解多少呢？

“中国皇后号”来华后，广州的中国人开始与美国人接触。在相貌、衣服、语言上都和英国人相仿的新来的美国人初到广州时，除了个别有经验的行商，通过打交道，才会识别并称呼美国人为“新国民”，其他人对美国还是不清不楚。

“中国皇后号”管货员山茂召(Shaw Samuel)在其日记中记载了中国人被告知英、美乃是两个不同国家之后，对这些远道而来的“新人”既友好又好奇的情形：

你不是英国人吧？

不是。

但是你讲英文，所以当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说不出什么区别；但是现在我很明白了。在我跟英国人讲价钱的时候，他说：这么多——买吧，算了吧。我告诉他说：“不，朋友，我给你这么多。”他看着我：“滚开，瘪三；怎么！你到这儿来，给我的货定价钱吗？”的确，大班先生，我看得很清楚，你不会是英国人。所有中国人都很喜欢你们的国家。

^① 如嘉庆十五年十月，“所有英吉利船常被米利坚在夷洋拿获”(见《粤海关志》卷二十九，第 14 页)。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pp. 9—10.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p. 11.

^④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 228.

^⑤ 1821 年，在黄埔美国商船“艾米利号”(Emily)服务的意大利籍水手德兰诺瓦(Terranova)丢弃或投掷一个瓦罐，砸在一只小船商的民妇的头上，致其落水而亡。中国政府要求美方把德兰诺瓦交出，但被拒绝，因此停止美商贸易。在广州官员封舱的威胁下，美国船长只得听任中国官员上船逮捕涉案水手，经过审判，该水手被处以死刑；美国政府事后也默认了中国政府的处置。

山茂召写道：“至此为止，我敢说这个人的评语是使我满意的。可是为公道计，我还不得不加上他的结语，‘人们初来中国时，都是非常好的君子，都像你一样。我想你多来广州两三趟，你也变得跟英国人一模一样了。’”^①至1795年，美国人到广州十年了，其广州贸易在1790年就已“站稳了脚跟”^②。中国官吏还把他们和英国人混为一谈，最终英商向两广总督提出要求说：

呵贲哩噶(即美国人)也会我们的话，也是我们这样衣服，另有旗号，不要和他们混到一块。

受理此事的两广总督长麟曾陪伴马嘎尔尼使团，素以通夷务著称，还算通情达理，对其请求加以改善后予以同意。他批复道：

此条应存记备查，遇有事件，自应查明旗号办理，不致牵混影射。^③

可见，中美实际上的频繁接触，并没有让中国人知晓美国。

在中国人认识美国的第二个阶段，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群体向中国人介绍美国，那就是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

1807年，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受英国伦敦会^④派遣到中国传教。一般认为，马礼逊是来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的1807年是新教向中国传播的开始。1812年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⑤又受伦敦会派遣来到中国。米怜到达澳门后，由于受天主教势力的排挤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反对，转到广州，数月后至马来亚，后来定居马六甲，致力于创立英华书院，还

^① [美]丹特涅著，姚会虞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77页。

^②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第14页。

^③ 《粤督批英商唆囉所稟一事件》，载许地山编：《达衷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辑，文海出版社，第169—170页。唆囉，Brown，英国洋行大班，乾隆五十七年来华经商。

^④ 1795年博格(Dr. Bogue)等人成立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Board)，开始把目光转向远东，宣称“惟一目的是在异教徒和其他蒙昧民族中传播基督教的知识”。伦敦传教会由英国国教会、公理会和长老会等组建而成。该会规定开展“超宗派”(non-denominational)海外传教活动为该会的基本原则。(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pp. 54—55)伦敦会传教士米怜曾对该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进行过一段阐述。他认为该会的旨趣不在于把它办成国教会、公理会和长老会的海外传道差会，而是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使其不带有任何一个单独教派的特征。因此它的事务就不是由哪一个教派的机构来决定，而是“由一个理事会来管理，该理事会的成员，每年一次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两个国教会、各个不同国教者的团体，以及该会所派出的，分别来自不同教会团体的传教士中选拔”。(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pp. 5—6)

^⑤ 米怜(1785—1822)，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生于阿伯丁郡，1812年受牧师职。曾将《旧约圣经·申命记》、《旧约圣经·约伯记》译成汉文。

开办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英文刊物《印中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伦敦会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①和戴尔(Samuel Dyer)^②后来也加入了马礼逊和米怜的传教工作。

受英国伦敦会的影响,美国海外传教理事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③于1810年成立,并在1830年派裨治文和雅裨理赴华传教。

虽然在美部会成立初期,伦敦会拒绝与美部会合作,但是两个组织后来还是密切联系,其中,马礼逊就起着枢纽作用。

由于英国当时存在反对海外传教士去印度和远东的思想,^④东印度公司害

① 麦都思(1796—1857),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生于英国。1816年离英东渡,翌年抵达马六甲学习东方语言,协助米怜管理印刷所,1819年于该地任牧师,后去槟榔屿和爪哇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在华侨中进行传教活动,几近二十年。1835年抵广州,并北游中国沿海地区,探悉风俗民情,散发传教书刊。鸦片战争结束后,于1843年起定居上海,开设墨海书馆。1848年违反《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越出上海县界,到青浦县散发传单,受到群众抵制而酿成“青浦教案”。1854年任英国驻华公使包令(John Bowring, 1792—1872)的译员,并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收集情报,供英国政府参考以决定对太平天国的策略。曾参加《圣经》汉译,并编写《汉英字典》和《英汉字典》等,有中、英、马来文著作九十余种。1856年回国述职,次年病逝于伦敦。其子麦华陀后任英国驻上海领事。1904年伦敦会在上海设麦伦书院(Medhurst College),以他的名字命名,作为纪念。

② 戴尔(1804—1843),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青年时就读于剑桥大学,1827年到槟榔屿,1835年定居马六甲,管理伦敦会设在那里的印刷机构,并往来于槟榔屿、新加坡、香港、伦敦等地,从事教会活动。1843年死于澳门。有中英文著作五种。他在中文出版史上有一重要贡献,就是用中文铅活字代替以前的木刻雕版。

③ 美国海外传教理事会,英文名缩写为A. B. C. F. M.,在华称“美部会”、“公理会”、“纲纪慎会”等。美部会的权力机构叫“咨询委员会”(Prudential Committee),设在波士顿。咨询委员会由美国公理会、长老会和归止会的著名人士以及热心传教事务者组成,一般在12人左右,每周举行一次会议。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实施美部会的规章制度,调查可能传教的区域,标明发展传教事业的地区,而后决定这些传教团的规模并监督指导它们。另外,委员会还直接任命、指示美部会的传教士。而具体操作这些功能的是咨询委员会秘书。美部会成立不久就派人与伦敦会联系,希望与之合作,但被拒绝,于是委员会决定开创自己的传教事业。1812年1月,美部会派遣第一批五名海外传教士到印度。(Phillips. *Protestant America and the Pagan World*, pp. 32—33, cited by Lazich, ibid. p. 35)之后,美部会迅速发展,到1833年,它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60个传教站,所属传教士100人。(Missionary Herald, vol. 30, p. 8.) (转引自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④ Ride Lindsay. *Robert Morrison, The Scholar and the Man*.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4.

怕传教士的活动会损害他们与中国的贸易,^①并且对新教传教士怀有敌意,所以拒绝传教士搭乘他们的船只。因此,马礼逊无法直接乘船到南洋和印度,只好取道美国去中国。

马礼逊在 1807 年 4 月 20 日到达纽约后访问费城,并发表一系列演讲。马礼逊的演讲引起美国基督教会对外传教的关注,也赢得美国政府及美商对马礼逊传教事业的资助。美商奥立芬(David W. C. Olyphant)为马礼逊提供免费舱位到中国,而国会议员麦德逊(J. Madison)给美国驻广州领事卡灵顿(Carrington)的介绍信,要求“在美国利益许可的情况下,给予这个英国人尽可能细致的帮助”^②。

马礼逊乘美国商船到达中国后,又寄居美国商馆达一年之久,因此,有学者说:“马礼逊博士著名的传教事业中,美国人所做的贡献颇值得注意。”^③

马礼逊等人来华后,面临的是清政府的禁教政策。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人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

在中国朝野弥漫着天朝上国观念的气氛下,一部分传教士认为必须采用世俗的手段,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推广世俗知识的首要步骤就是让中国人懂得外国历史和地理,所以从 1815 年传教士所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④起,地理知识就占有重要分量。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介绍的世界史地知识、民情风俗,大多语言简略,但新鲜知识不少。其中就有对美洲和美国的介绍。比如在卷六《论亚墨利加列国》一文中,作者介绍了美洲的地理,并特别表彰了哥伦布的功绩。在卷七《论北亚墨利加之列国》中,又简短、准确地介绍了美洲年轻的国家——美国。

麦都思编的《地理便童略传》^⑤对美国的形成历史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特点也有所介绍。其中第八回即为“论亚墨利加”,譬如有问:

^① 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涅特认为是因为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政策存在差异:英国大概不想因为传播基督教而使中国接受西方文化,从而获得与中国知识平等的机会,致使英国不能在中国获得厚利。见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 64 页。

^② Eliza.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1838, vol. I, p. 131.

^③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第 57 页。

^④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 年 8 月 5 日在马六甲正式创刊,由马礼逊筹办,米怜负责编辑,是近代第一份中文杂志,刊载内容主要是宗教方面,其次是世俗方面。该刊从第二年开始刊载一些有关地理学的内容。

^⑤ 《地理便童略传》,麦都思编,1819 年在马六甲出版,共 21 页,是一本供小学生用的简明教科书。全书分 8 回 60 问,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边界、面积、物产、人口和宗教情况都作了介绍,包括美国和俄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

花旗国本来如何？

答曰：花旗国本来是旷野的地方，惟自初见知亚墨利加地以后多人从英吉利国往到那边，但凡在本国困苦、被害、想要出外者，连商贾等人，都往彼处。或这处几百人，那处几千人，耕田、筑城而住，成为十余小国。后来英吉利王要他们都纳关税，他们不肯，就合聚成一大国，自设朝廷，而不再于英吉利国管下。英吉利王差兵伐他，不胜，故此到如今，他自立为一国也。

还有问：

花旗国之朝廷如何？

答曰：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其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①

《地理便童略传》本身篇幅不长，而且可能极少流入中国，今天从传世文献中几乎没有发现它在国内有什么影响。^②

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的是，郭实猎在 1833 年 8 月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西方文化，改变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印象。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刊号来说，其主要文章计有：序^③、东西史记和合^④、地理、新闻、东西洋并南洋图。《东西史记和合》系麦都思将东西方历史上的大事，自远古直至 1820 年对照排比，借此向华人显示世间另有悠久的高度文明。

为介绍西方地理知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创刊号起就设有专栏，较多地介绍世界区域地理知识，也有些篇幅介绍地震、气候和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此外，一些专文以及个别新闻报道中也有叙述各国地理。迄至戊戌九月

^① 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5—116 页。

^②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26 页。

^③ 除了创刊号有《序》外，其他各号（1833—1835）也常刊登《论》为其卷首语。

^④ 《东西史记和合》是麦都思于 1829 年在巴达维亚出版的小册子（《天下新闻》也曾刊登其摘要）。《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创刊号开始至乙未五月（1835 年 6 月）号，就一直连载该书。该书将中外历史依年代分成上下两段比较记述——上段为中国史，下段为西洋史。郭实猎如此重视《东西史记和合》，目的是要让读者明白西方的历史十分悠久，有源可溯，并不逊于中国。至于介绍地理、科学知识与穿插彩色地图，正如前面所述一般，无非是要扩大中国人的眼界，让他们知道中国人还有不少东西得向西方学习。

号,共载世界地理类文章达 35 篇,但主要是东南亚、南亚和欧洲各国的史地知识,^①涉及北美或美国的仅有《北亚米利加》、《地理全图之总论》、《列国地方总论》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还有地图若干。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较为详细地提到美国的只有两篇文章。一是道光丁酉年五月之《论》。该文共约 880 个字,简略介绍了“花旗国”的发现、独立战争的爆发,以及公会(国会)和魁首领(总统)制度等。^② 二是 1838 年 7 月的《亚墨利加办国政之会》,该文也有 800 余字,介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③

还有提及美国的一些新闻类文章,如:“北亚墨利加兼列国殷殷兴隆,独有二邦与列国不相合。”^④ 其他相关新闻还有《亚米利加兼合国》、《北亚米利加合郡》、《华盛顿言行最略》,^⑤ 等等。

其他有关美国或北美的文章大多是在述及欧洲等国家的历史地理时稍有提及,比如《列国地方总论》、《欧罗巴列国之民寻新地论》、《新闻纸略论》^⑥。

通过新教传教士的传播和中美实际的接触,中国人对美国多了些了解。

1817 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在向朝廷报告有关美国船只走私鸦片问题时,称美国来华货船较多,最为恭顺,并谈到美国没有国土,头人四年一换,并注意到美国政体与一般国家不同。谓及:

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⑦

但是,国人对美国的历史、地理位置、政制等情况,还是模模糊糊的,并不确切。被称为“一代硕学”的阮元在撰修《广东通志》时,尚“不知(英吉利国)何时占据北亚未利亚”^⑧,误把南北美洲混为一谈,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境内,云:

利未亚为五大洲之一,其地……有马逻可弗沙、亚非利加、奴米弟

^①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第 17 页。

^②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231 页。

^③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389 页上。该文称呼美国为“美理哥”、总统为“统领”,与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的用词一致。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差不多同时出版,完全有可能就出自裨治文之手。《华盛顿言行最略》中也用“美理哥”。

^④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93 页。

^⑤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348 页上、第 297 页下、第 319 页下—第 320 页上。

^⑥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101 页下、第 234 页下、第 76 页下。

^⑦ 《两广总督蒋攸铦奏报美鸦片船被抢现量予赏恤并晓谕严禁鸦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 200 页。

^⑧ 阮元主撰:《广东通志》,卷 330,列传 63,《英吉利国》,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

亚。亚米利加即亚非利加，有陆路通小西洋之如德亚，今分南北。^①这里，把当时称呼非洲的名字“利未亚”和非洲的全称“亚非利加”当做两个地名，而又把“亚米利加”和“亚非利加”做一个地方，从而错误地认为“亚米利加”是陆路，与如德亚（即巴勒斯坦）相通，属于利未亚（即非洲）的一部分。更在《广东通志·外蕃传·案语》云：

利未亚，在欧逻巴之西南，……今之大英吉利、米利坚等国，皆利未亚也。^②

学问渊博而又关心世界大事的开明之士梁廷枏于道光年间修撰的《粤海关志》中沿袭旧说，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他写道：

若加那英吉利（即加拿大），若米利坚，则利未亚之地也。^③

显然阮元等人对美洲或美国的确切位置毫无所知。

叶钟进的《英吉利夷情记略》（约 1834 年）虽然没有上述错误，而且称誉美国“沃衍宜五谷，周亦数千里，人勤力作，常以余粮济各国”，但是对美国的历史沿革、政治体制等情况并不清楚。他把北美独立战争描述成：“英夷常起兵攻之，十余年不能胜。”对政制的描述则为：“设十二酋以理事，一酋死，复公举之……”^④

林则徐到粤之前，同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人一样，对外国史地、世界形势几乎茫然无知，竟然以为都鲁机（即土耳其）属于美国。^⑤

在鸦片战争前，也有个别中国人亲历美国，归国后写有游记，主要是谢清高^⑥的《海录》^⑦。

^① 《广东通志》卷 330，列传 63，《咪喇坚国》，第 60 页。

^② 《广东通志》卷 330，列传 63，《咪喇坚国》，第 61 页下—第 62 页下。

^③ 梁廷枏：《粤海关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81—184 辑），卷二十四《市舶》按语。

^④ 叶钟进：《英吉利夷情记略》，载《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乙编，第 789 页。

^⑤ 这是林则徐在 1839 年 12 月接见英国医生喜尔（Dr. Hill）等人时，闹出的一桩笑话：……讲至出产都鲁机（即土耳其）鸦片时，钦差即问：“都鲁机是否系米利坚地方？抑系美利坚所属之地？”我等回答：“不，只离中国约一月水程。”钦差同各位大官员，尽皆似是惊讶。《鸦片战争》（二），第 426—427 页。

^⑥ 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金盘堡人。早年受雇于外国商船，历海上诸国，习其语言，凡十四年（1782—1795），后以双目失明返，流寓澳门，以通译为生。后来碰到同乡杨柄南。两人相与谈论海事，发现所述与外界流传多有不同，于是由谢清高口述，杨柄南笔录，著成《海录》一卷。

^⑦ 由于樊守义的《身见录》埋没不彰，所以人们多以为“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自谢清高始”。《吕调阳序》，载谢清高口述，安京校释：《海录校释》，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331 页。

《海录》1820年在粤刊刻,介绍了英、法、普、奥、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美利坚等国。在“咩哩干国”和“亚咩哩隔国”条下,简略地描述了美国和南美各国的情况。

虽然在“咩哩干国”条下,谢清高对美国的风俗、物产、交通工具等都有正确的介绍,但是谢清高又把美国说成与英吉利相同,“亦海中孤岛”,而且“疆域稍狭”,^①可见,所述内容并不确切。

上述情况表明,鸦片战争前,美国人到广州五十余年来,代表清政府在广州办理外事的两广总督们,并非没有机会了解美国,亦非没有碰到需要他们调查处理的和美国人有关的事。可是,他们缺乏了解外部世界的热情,致使虽知“省城有几国夷人”^②,但是除了应允遇事查明旗号办理以外,对发生在外洋的事概不过问,对发生在“内地洋面”而不能不问者亦不深究,借口“无从查考”,却无法把这些“夷人”完全分清。

中国人对美国依然认识不清,一方面源于闭关自守的环境中“天朝上国”观念的滋生,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人自己撰写的中文著述对美国的介绍不全面。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出版物对美国的介绍,相对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而言,当然更加详细、准确,但是这些介绍比较零散,内容不多。而且在这些出版物中,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外,其他很少流入中国内地,所以它们的影响不是很大。系统介绍美国历史沿革、地理位置等各方面内容的当属裨治文(E. C. Bridgman)——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第三阶段,从19世纪中期(1840年)到19世纪末。

中国人比较准确,而且比较多地了解美国,是在鸦片战争后。

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更多中国人睁开了眼睛。统治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感到有必要修改对外政策,学会和外国打交道,开始主张了解外洋情况,培养外事人才。中国人了解美国及至世界的途径增多。也就是在此阶段,中国才开始真正认识美国。

了解的渠道,首先是西学的书籍和报刊越来越多。新教传教士继续向中国传播西学,译介了许多书籍,创办了许多报刊,其中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两次重版。这些报刊书籍传递了大量有关美国的信息。

中国人了解美国的另一个渠道是中国人走向世界,亲眼目睹西洋文明。

^① 谢清高口述,杨柄南笔录,安京校释:《海录校释》,第264页。所以从其所述来看,不能确定谢清高曾亲历美洲。同时,该书当时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② 《广东巡抚为黄亚胜被夷人截伤身死事下南海县札》,载许地山编《达衷集》,第87页。

1847年第一批留学生包括容闳在内的三人赴美，到1872年则有首批官派留学生30人赴美。期间，清政府多次派人到欧美游历。从1876年起，清政府还开始在欧美各国和日本派驻公使和领事。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出洋游历章程》，当时出洋人员均须撰写出使、游历日记，抄送总理衙门，以备刊刻。正因为如此，这些出使游记也就有了特殊的价值，成为中国人了解美国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这些介绍，还是显得比较分散、凌乱。

以上两个渠道中提供的美国知识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其中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仍是中国了解美国的重要材料。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合省国说》、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书都以《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重要参考资料。到19世纪后半叶，不少中国学者就是以裨著为底本校释其他史地著作，日本、美国、中国三国史家在撰写中文美国史著作时也都曾受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影响。

因此，在中国人了解美国的历史中，裨治文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是一部较为重要的著作。

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又从何而来呢？美国著名学者泰特·丹涅特（Tyler Dennett）说：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几乎是从零开始的。^①

建国前的美国与中国没有直接往来。由于美国与欧洲国家存在着文化渊源关系，欧洲对中国的一些认识影响着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随着“中国皇后号”来华，中美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从间接走向直接。

但是这种认识还是非常有限的。美国人把亚洲看做一个整体，称它为东印度，……美国的许多开国元勋，对中国也知之甚少。在他们生涯的后期才偶然碰到中国这个题目，并发现它是新的未加研究过的问题。开国总统华盛顿甚至长期相信中国人是白种人，直到1785年，一个记者纠正了他的这一错误观念。^②

在这有限的认识中，传教士是较为重要的传播者。

最早来到中国的美国商人、冒险家和海员，对中国的兴趣只是做生意。他们的知识水平限制了他们对中国古老文化的认识。而19世纪30年代，继商人和海员之后，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可以说，美国人开始较多地接触中国人和了解中国是从传教士开始。“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人是通过传教士的

^①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2页。

^② 欧内斯特·梅等编：《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齐文颖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眼睛来观察亚洲的。”^①而第一位来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不遗余力向中国人介绍美国历史、西方文化的同时，写了大量英文文章，向美国介绍中国。著名的《中国丛报》就是裨治文主编的。

总而言之，早期来华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是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传播者。

可是，目前学术界对鸦片战争前米来华的早期新教传教士的研究十分有限。1985年，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费正清，在谈到新教传教士的研究状况时说：“在19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得最少，却是最有意义的人物。”^②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有所改变，但相对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研究而言，还是薄弱得很，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数量都不多，论者大多是在论述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时顺带略述，对第一位来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其人其著作专门论述的更少。

国外最早介绍裨治文的著作应属裨治文夫人在1864年裨治文逝世三年后编写的《裨治文的生平与工作》(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这本著作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次是，英国传教士兼学者伟烈亚力在1867年编辑的《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这部著作按每个传教士来华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汇集了1867年之前所有来华传教士的传记资料，其中就涉及裨治文的生平和著作。此书是后人学习研究的重要材料，但比较简略。以上这些著作的作者与早期传教士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同时，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传教士的了解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1996年慕瑞·鲁宾斯坦的《英美在华传教事业的起源》(Murray A. Rube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出版。此书对鸦片战争前伦敦会和美部会传教士在中国华南的传教活动作了详细的探讨，比较透彻地研究了两个差会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的起源、具体事实和演变过程。其中第六、七、八章节介绍了裨氏的家庭背景，皈依经历，世俗教育和职业训练，以及被中国传教团征召的经历，并且详述裨治文在1840年前在马礼逊的帮助下建立美国传教士基础的活动。遗憾的是，鲁宾斯坦没有论及1840年以后传教士们的活动。2000年又有Michael C. Lazich出版

^①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474页。

^② Suzanne W. Barn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

了《裨治文，美国第一位赴华传教士》(E. 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①，是学术界第一本系统研究裨氏的著作。该书运用丰富的资料按时间顺序全面描述裨氏的生平。该书还分析了美国19世纪上半叶的宗教生活与对外传教运动的兴起。

国内在有关裨治文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专著出版。比较有影响的属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该书选择29位比较有影响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分别为之作传，其中之一即为裨治文。相关内容主要参考《中国丛报》和裨治文夫人所编的《裨治文的生平与工作》来梳理裨氏基本生平和活动。

1993年9月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化中国论文集》，由台北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推出，其中载有《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牧师与早期中美关系——纪念裨治文牧师到广州传教一百六十周年》。该文对裨治文在华之传教事业、创设之组织及贡献、对中美文化交流之贡献，以及支持林则徐禁烟运动和参与签订《望厦条约》都有论述，只是受篇幅限制，所述并不详细。

2000年，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此书在内容上基本涵盖了这段历史的各个方面：新教传教士的宗教活动，他们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他们从事的医疗和教育活动，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传教士与近代西方的中国学等众多问题。其中不乏对裨氏其人之介绍。

至于第一本中文美国史著作《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国内极少有人能看到原著。1997年《近代史资料》(总92号)刊登了刘路生点校本，该本自称以道光十八年新加坡坚夏书院藏版为蓝本。刘路生点校本存在一些不足，在内容上，不但漏掉原著上卷两章，还把对两个不同州的情况编排成一个州加以介绍(笔者已对此作一勘误表，见附录)。

由于没能阅读到原文，导致部分学者产生一些错误认识。如一些学者在阐述《海国图志》所载有关美国的内容时，误认为是魏源直接所言，其实大多辑自《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又如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有一章专门介绍西方文字，认为：

二十六字母，散之则无穷，合之则有限，其用不测，然虽三尺儿童，亦可学习。凡天下事物皆赖二十六字详说之。其始岁历几百，稿三易

^① Michael C. Lazich. E. 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N. Y., 2000. 2008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由尹文涓翻译。